



自1987年7月在《滇池》发表第一篇小说《骑驴》起,至《民族文学》2025年12期刊发中篇小说《半农兴农记》止,近40年的时间里,布依族作家潘灵的小说创作是持续坚韧且丰沛生长的。他已出版长篇小说《血恋》《情逝》《红风箏》《香格里拉》《翡翠翠寒》《泥太阳》等8部,中短篇小说集《风吹雪》《奔跑的木头》《太平有象》《潘灵作品精选集》4部。其中,《泥太阳》获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。在其小说创作过程中,一种立足于边地野力、现实奇幻与人性曲幽的写作风格,在这位出生于云南昭通的作家心中悄然生根,并持续进行着阶段性转换和融合性发展,令其小说展现出独特的现实感、民族性和现代性。

边地野力的纵深

潘灵小说中有一种迷人且很难说得清楚的“隐形之力”,我暂且称之为“边地野力”。

出生于1966年7月的潘灵,从一开始就拥有多重向度的模糊身份。比如,潘灵出生在以汉族为主体的昭通巧家县,自己却是布依族。民族大杂居的特点导致潘灵早年误以为民族身份是一个空洞的符号,但后来文学创作激活了他,让他意识到在自己的基因中,存活着本民族强韧的文化密码。再比如,作为布依族的潘灵,笔下却多有其他民族如彝族、藏族等的深情描摹,如中篇小说《风吹雪》讲述的是滇东北彝族土司的故事,长篇小说《香格里拉》叙述的是云南中甸藏族土司女儿与美国飞行员的故事。在2021年的一次访谈中,潘灵坦言,“我写作几十年,其实没有一部作品让我百分之百满意,我并不是一个自信的作家。如果硬要挑一部,我会说我喜欢我的中篇小说《奔跑的木头》,我看似写了一个彝族故事,塑造的却是一个布依族的平民英雄。木头的忠诚,胜过了他的超能力”。

这是怎样一种矛盾而激越的文学理念和创作构想啊。然而,正是这种看似混沌野性的原生张力,塑造了潘灵小说中最难能可贵的边地野力。这股强悍的边地野力如同非凡的骨架与肌理,强力支撑着潘灵的小说创作,构架出潘灵小说谱系中有别于他人风格且令人着迷的纵深推力。比如《骑驴》,只有千把字,但小说中毛四饲养的“神驴”蛮横无由,径直把别人家的新媳妇驮进自家园子,成了毛四的媳妇。在此,边地野力初见端倪。从小小说的成熟度来看,1989年7月发表的中篇小说《乌蒙情仇》才是潘灵真正意义上的发轫之作。这部写作技法尚显粗糙的作品,却有一股边地野力的自在狠劲,制造出令读者难以释怀的文学锐度。

随着潘灵小说写作的逐渐成熟,边地野力在其后来的作品中,又有了某种纵深的蜕变与发展,生出深刻的戏谑性,小说的弹性与力度巧妙隐藏在不动声色的荒诞叙事中。在《一个人和村庄》结尾,包伍明召集村里的家畜,进行一场名曰“丫口村春节联欢晚会”的荒唐剧,边地野力幻化成为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强烈讽刺,让小说在平静的叙述下暗藏惊涛骇浪般的喷涌之力,充分展示了寓于野力之中的美学思考。

现实奇幻的交融

和潘灵聊小说,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,就是他一再强调

作家龙仁青的文学创作沉静静美。他将故乡的热爱倾注于青海高原的苍茫壮阔、草原儿女的刚柔相济、飞鸟与花朵的多姿灵动中,凝结成中短篇小说集《唐僧肉》。这些发生在青海高原的故事又可称为牧民与草原的故事。草原的亘古无垠与自然舒展的人性,是小说集温柔而坚定的归旨。

这些故事本质上在探讨同一个主题,即现代化进程如何影响草原上的人与自然,草原上的人与自然又如何看待、接受和反作用于现代化本身。作者从不同侧面表达了他对草原生活变迁的观察与思考:《情歌》《奥运消息》等从草原生活的细微处与牧民心灵的纵深处起笔,展现土生土长的年轻人对民族和文化身份的自豪认同;《锅庄》《转湖》等讲述逐渐融入城市生活的草原后代的生活状况,抒发他们对草原母亲的故土难离与回望靠近;《水晶晶花》《玉树情歌》等写出草原人与城里人尤其是与远方来客间的交流磨合,表现了草原对远方客人的深切吸引。作者对草原与城市文明的相交相融也进行了反思,《转世》《一匹叫名扬天下的马》等作品拓展了地域写作与民族写作的文本向度。

龙仁青的写作始终朝文化与人的沟通交流敞开。他想写出草原的切实存在,以及草原儿女在历史和时代的演进中所获得的幸福与尊严。《光荣的草原》中,摩托车已然替代马匹成为牧民们的日用交通工具,畜牧业的收缩、旅游业的发展也是大势所趋。在此背景下,年轻的扎括依然选择继承父亲的白马和骑手身份。尽管按照商业演出的逻辑,扎括不得不输掉比赛,但他有信心成为第一名的骑手,并为自己、为草原感到荣耀和骄傲。扎括的故事与小说集中其他故事一道,坚定地传递了作者的创作立场——走近草原就意味着走近幸福,回归大地就意味着回归尊严。

在小说集的文学空间中,草原不是人工滤镜修饰后的符号化的山水田园,也没有降格为营造叙事氛围的环境要素。作者借明艳的色彩、丰富的声音、杂陈的气味,将苍茫壮阔的空间与流淌不息的时间浓缩在文本中。青海湖是“融化了的天空凝固在了地上”,阳光“把自己微缩的影子,映入了每一株草叶上的每一颗露珠里”。自然界的强弱、生命的荣枯,都仿佛浩瀚星月与人类帐篷之间的千灯互照。在作者笔下,草原恢复了它

边地野力、现实奇幻与人性曲幽

——论潘灵小说

□段爱松

近40年的时间里,布依族作家潘灵的小说创作是持续坚韧且丰沛生长的。在其小说创作过程中,一种立足于边地野力、现实奇幻与人性曲幽的写作风格,在这位出生于云南昭通的作家心中悄然生根,并持续进行着阶段性转换和融合性发展,令其小说展现出独特的现实感、民族性和现代性



自己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,心中却储备了数不清的奇幻基调。所以,千万别被这个表象骗了,先看一看潘灵小说的题目——《泥太阳》《偷声音的老人们》《奔跑的木头》……这些充满想象力和律动感的标题,暴露了潘灵的超现实主义思考。

确实,从一开始到现在,潘灵都秉承着现实主义创作理念,但他骨子里又是超现实主义的。在2022年出版的小说集《太平有象》代序里,他说过:“从20世纪开始,小说就是一种革命性的文体……我一直在努力,寻找一种更为诗性的表达……”无论是自觉还是非自觉,潘灵的小说创作,自始至终都保持着现代性思考下的鲜活探求。在潘灵的小说中,现实与奇幻的交融极具张力,现实主义的外壳下潜伏着一条巨大的“灵蛇”。它不仅在小说的标题与主题上投下过狡黠的阴影,也在众多看似朴素的边地叙事与寓言思案中,注入过迷幻的光影。比如中篇小说《幽灵诉》,采用亡灵视角,对现代城乡发展进程中人的归属问题进行了有力剖析与呈现。亡灵视角的使用,使得小说的现实叙述基调获得了一种泛音般对位的复调

性,赋予小说一种亦真亦幻的朴素的悲剧感,直击读者内心。中篇小说《豹子》在人物心中暗设代表人性欲望的“豹子”,令小说在严丝合缝的现实叙述中,生出带有后现代色调的迷离氛围。《奔跑的木头》中,仲家小伙木头在现实生活中展现出的战斗神力,以及小说对人与神灵进行沟通的刻画等,都赋予作品不一般的品相。

最能代表这种交融性的是《神兵天降》和《替身》两篇短篇。《神兵天降》以民族抗战为大背景,集合了科学、民族文化、民间传奇等因素,不仅让历史以一种鲜活的传奇方式复活,更让现实以另一种神奇的方式追溯历史,奇幻叙事照亮了民族大义,现实主义获得了深邃的理想照应。《替身》在潘灵的小说创作中具有里程碑式意义,这不是说这部小说比其他小说更好,而是这部小说将科幻元素直接嵌入到潘灵惯常的写实创作中,产生了某种文学“卡顿”。这种卡顿扩大了现实与奇幻交融的边界,让潘灵的写作豁然多出一片天地,也让潘灵的文学创作获得了新的可能。这或许也是潘灵在探索多年后产生的

在叙事暗堡里寻找人性坐标

——评陈刚小说《城防图》

□陈胜乐(土家族)

一下,挤出一丝苦笑”,向胡文胜要烟,两人目光“似在掩埋一桩往事”。他吐掉烟蒂,抬眼看天,“太阳已经羞愧地躲进云层”。这种灰色地带的人性刻画,让罗远清不再是脸谱化的叛徒,而是被命运压垮的普通人。

小说结构是另一种“城防图”。陈刚将军事地图的“分层防御”植入叙事,形成“图中有文、文中有图”的榫卯格局。核心防线是胡文胜(侦防处长兼潜伏者“锥子”);外围是魏峰林(在忠诚与正义间摇摆成长);警戒线则是罗远清、田立兵、周维君等配角。这种结构在主悬念外衍生多个次级悬念,让读者始终紧绷。陈刚并未让人物沦为功能单元:魏峰林从听命者变为思考者,在目睹罗远清被决杀后第一次提出疑问,在跟踪中怀疑侦防处内部,完成了精神觉醒。胡文胜更是复杂。他在黑暗中潜伏太久,几乎忘记本来面目,当他在大药房说出“真担心组织上把我遗忘了呢,两年多啦”时,伤感与激动交织。这种多面性,正是真实人性的魅力。

陈刚通过亲历者讲述和史料,还原了宜昌解放前夕的真实街巷(怀远路、墨池巷、二马路等)和机构(侦防处、银座咖啡馆、同德元大药房)。甚至“日本产的玛利亚微型相机”,也是当时特工的常用设备。这种对“物”的尊重,让小说获得扎实的历史质感。比如魏峰林穿着“圆口千层底布鞋”,“左脚小趾附近塌陷了一个坑”,既暗示旧伤,又透露俭朴。胡文胜在威胁周维君时,从“两根黄鱼”到“二十根也不止”,再到不要金条只要帮忙,充满心理战张力。这些细节让读者产生强烈的在场感。

红色题材写作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传统深厚,但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些固定模式。《城防图》在恪守革命历史题材立场的同时,为其注入了新活力。其“新”体现在

三个方面:一是叙事视角创新,以胡文胜的潜伏者内部视角展开,让每一步都充满夹缝中的风险与张力;二是人性勘探深度,即使是周维君这样的投机者,陈刚也写出了他的恐惧、挣扎和有限的“勇气”,他拍下城防图是出于自保,却成就了革命;三是叙事美学的自觉,语言、结构、节奏精密咬合,形成独特的叙事风格。

《城防图》短促、冷峻,像一柄淬火的短刃,在有限篇幅里完成对人性的深度测绘。这种测绘往往通过行动描写来实现。胡文胜几乎没有内心独白,但通过他的行动,接听电话的激动、盘算城防图的目光,读者能感受到他内心的重量。这种“不写之写”,比直白的心理描写更有力。

小说结尾是开放式的。城防图已获,但身份是否暴露?魏峰林是否会成新威胁?悬念依然悬置,让读者合上书后仍忍不住想象人物命运。那张“宜昌城防图”早已超越军事图纸,成为信仰、牺牲、人性与历史的复合象征。当读者捧起这本书,看到的不仅是惊心动魄的谍战故事,更是一幅用文字绘制的人性地图,每个人物都是坐标,每段情节都是等高线,共同测绘出一个时代的精神地貌,以及在那片土地上艰难生长却不曾熄灭的信仰之光。

战争会结束,城防图会泛黄,但那些为信仰而行走 in 黑暗中的人,那些在极端环境下坚守的人,他们的故事会被文学一次次照亮。《城防图》用精确的叙事搭建起通往历史的桥梁,让读者跨越70多年,去触摸曾经真实存在的生命,感受那些炽热、犹豫、坚定、破碎的心灵。这或许就是文学最本质的力量:它不是历史,却能让我们的比历史更真切地抵达过去;它不是档案,却能比档案更深入地理解人性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